

重构“多声部的合唱”

——论 16 世纪意大利天主教会的双重革新思潮*

付亮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16 世纪的意大利天主教革新被等同为“由特兰托大公会议形塑的改革”，教皇被视作革新运动的枢纽与最重要的驱动力。但当时的意大利天主教会已有多重革新思潮，堪称一部“多声部的合唱”。无论是人文主义改革家和宗教社团，抑或是新派修会与改革派主教，无不以革新教会为任，提出自己的革新思想。遗憾的是，在历史递嬗的进程中，各种因素的影响下，由“特兰托主义”与“特兰托时代”构建的“特兰托迷思”，逐渐将多元复杂的天主教会革新思潮简化为由罗马教廷主导的单一改革路径阻碍后人理解近代以来意大利的宗教史发展脉络。本文拟着重分析几种具有代表性的革新思潮，重构彼时的多元革新理念。

关键词：教会革新 特兰托迷思 回归本源

作者 付亮，历史学博士，暨南大学历史学系、欧洲文明研究中心副教授。

一、问题的提出

纵观近代早期史，一部多声部的合唱被“特兰托迷思”（the Myth of Trent）简化为一曲独唱，追求革新的“众声喧哗”为罗马教廷的改革“单声道”所取代。所谓“特兰托迷思”，实则有双重含义：一重是历史的层面，即“特兰托主义”（Tridentinism）^①；另一重则是史学的层面，即“特兰托时代”（Tridentine Era）^②。“特兰托主义”是指罗马教廷自 16 世纪晚期以来逐渐有意识地垄断对特兰托大公会议（the Council of Trent, 1545 - 1563）的解释权。所谓“特兰托时代”，其实是“耶丁范式”（il binomio jediniano）的同义语。德国教会史巨擘胡贝特·耶丁（Hubert Jedin）自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始终坚信中世纪晚期至 17 世纪中期的天主教历史理应被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政教关系核心文献整理、翻译与研究”（18ZDA216）的阶段性成果。

① 关于“特兰托主义”的辨析，最为精到的分析，参见 Giuseppe Alberigo, “From the Council of Trent to ‘Tridentinism’”, in Ratmond F. Bulman and Frederick J. Parrella, eds., *From Trent to Vatican II: Historical and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9 - 37.

② 关于“特兰托时代”，除了德国学者耶丁的标准论述之外，美国史家考克雷恩的经典文章也很重要，参见 Eric W. Cochrane, “Counter Reformation or Tridentine Reformation? Italy in the Age of Carlo Borromeo”, in John M. Headley and John B. Tomarso, eds., *San Carlo Borromeo: Catholic Reform and Ecclesiastical Politic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Washington: The Folger Shakespear Library, 1988, pp. 31 - 46.

视作“天主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的历史。他认为，特兰托大公会议是这段教会历史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历史事件，堪称一个转折点；自此之后，此会议之前的分散的基层改革在教皇的引领下合流而成为改革的洪流，天主教会则循着“特兰托改革”蓝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特兰托时代”；此后的诸位教皇与众多主教正式开启“特兰托改革”之帷幕。抑有进者，受制于“耶丁范式”的元叙事，以耶稣会为代表的近代新派修会和诸多修道力量在历史书写中逐渐失去自身特色，只成为辅助教皇改革教会的简单角色。受耶丁的影响，此后的学者大多从特兰托大公会议及其改革教令出发，来探究意大利在宗教改革大潮中仍旧保留天主教信仰的原因。^①

实际上，由“特兰托主义”与“特兰托时代”构建的“特兰托迷思”，不但简化历史，更阻碍后人理解近代以来意大利的宗教史发展脉络。故而，本文拟以人文主义改革家、宗教社团与新派修会以及改革派主教等为例，分析几种具有代表性的革新思潮，重构彼时“多声部的合唱”。本文乃要强调：在当时的意大利社会，天主教会有多重革新思潮以应对当时的宗教危机，它们构成一部“对比复调”。这些革新理念虽各自独立，且为不同的旋律，却又以革新为宗旨，构成一个整体，彼此形成一种“和声”关系。只不过在历史递嬗的进程中，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这些旋律渐遭消声，以至于最终出现从多重选择到单一路径的历史结局。

二、16世纪意大利的宗教危机

危机往往伴随着机遇或创新。晚近的修正史学普遍认为，无论是新教的宗教改革，还是天主教的自身改革，虽龃龉冲突频仍，但从时代的大格局着眼却是因应社会嬗变的两股平行力量。两造都认识到基督宗教面临的严重危机，均竭力重新将社会基督教化，只是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从而呈现出不同的历史结果。^②

（一）身份认同危机

就当时的意大利天主教会而言，危机无处不在。随着路德引爆宗教革命，新教思想——特别是路德的三撇文——犹如燎原星火，在意大利北部的商路地区引发回应，甚至渗透到教皇国的核心地带。教皇利奥十世一方面囿于审视异端的惯性思维，另一方面受制于地缘政治上的博弈困境，未能也无法及时扑灭革命的火种。由此，本就在神职人员与信徒中间弥漫的身份认同危机进一步扩大化，对教会的不信任感进而加深。尤有甚者，在时人心目中，这种身份认同危机完全验证了佛罗伦萨多米尼克修会僧侣萨沃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对教廷与教会的痛斥与诅咒。萨沃纳罗拉是16世纪宗教危机爆发前夕的一位先知类型的人物。他痛恨神职人员腐败堕落，哀叹善与公义早已消亡，更感叹不义之人大行其道。他希冀天主教会能够经历凤凰涅槃，“回到本源”（ad fontes）。这位改革者曾在佛罗伦萨积极布道，开启一场原教旨主义式的革新运动，向时人宣传末世论思想，并重唤宗教热忱，鼓励信众放弃虚荣。其做法史称“萨沃纳罗拉危机”（la

① 有关耶丁范式的反思与分析，可分别参见 Paolo Prodi, “Il binomio jediniano ‘riforma cattolica e econtroriforma’ e la storiografia italiana”, *Annali dell’ Istituto storico italo-germanico in Trento*, VI, 1980; Paolo Prodi, “Controriforma e/o riforma cattolica: superamento di vecchi dilemmi nei nuovi panorami storiografici”, V. Branca e C. Ossola, eds., *Crisi e rinnovamenti nell’ autunno del Rinascimento a Venezia*, Florence: Olschki, 1991, pp. 11 – 21; John W. O’ Malley, *Trent and All That: Renaming Catholicism in the Early Modern Er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46 – 71。

② 持此说的学者当数英国史家伊文尼特与法国史家德吕莫，参见 H. Outram Evennett, *The Spirit of the Counter-Re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Jean Delumeau, *Catholicism between Luther and Vltaire: A New View of the Counter-Reformation*, London: Burns & Oates, 1977。

crisi savonaroliana), 震惊了罗马的当政者, 以至于最终遭到打压。^①

无论路德抑或萨沃纳罗拉, 皆认为末日审判即将到来, 他们的末世观、改革理念以及神学思考让神职人员或修会成员纷纷脱离天主教阵营。不止如此, 自中世纪晚期以来, 甚至在1517年路德革命爆发之后, 罗马教廷在神学教义方面迟迟未作出清晰的界定, 更无暇干预活跃的神学争论。多元观念乃是当时天主教世界的一大特色。在这样的局面下, 各路布道家纷纷登上讲道坛, 畅谈自己的神学观点, 拥有大量的听众与拥趸。由此, 争论与迷惑更为加深。特别是1527年的罗马浩劫, 不仅终结了意大利文艺复兴, 而且也沉重打击了意大利人的心灵与信念。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意大利地区出现了福音主义运动 (Italian Evangelism)。福音主义运动没有完备的组织体系, 也缺乏整套连贯的理念, 更不具备路德或加尔文那样的攻击性。质言之, 此运动是意大利宗教生活当中多元潮流的集合体。杰出的布道家与虔诚的平信徒都是该运动的支持者。福音主义运动追求回归本源, 改造个体信徒, 并按照圣保罗与圣奥古斯丁的精神圣化天主教会。^② 该运动的参与者对机械的神学教条兴趣不大, 但对新教思想兴趣浓厚, 并从中汲取营养。福音主义运动最为深切关注的是赎罪、因信称义、命定论以及灵魂救赎等议题, 其支持者大多从人文主义的角度加以探讨。他们汲纳的方法不唯教条论, 因而其思维模式也有内在的危险元素, 即与体制若即若离。福音主义运动的主导者与参与者大半由思想精英、文化精英以及有恒产且有一定识字能力的中间阶层人士组成, 他们对教义教条没有兴趣, 更有意远离教会中的实权派, 故而无意也无法领导更广大的群体。再者, 此运动与新教运动不同, 并没有革命的特性或裂教倾向, 因而不寻求用暴力或极端的方式改革教会。

这场运动极大推动了《保罗书信》在意大利的释读与研讨热潮。当时坊间出版的诠解书信的手册销路极佳。不止如此, 在意大利的许多城市, 研读《保罗书信》的团体或沙龙纷纷成立。具备一定教育背景的中间阶层人士——其中不少是商人与手工业者——定期聚在一起读经, 研讨信仰问题。沙龙往往由一个引导人负责整个圈子的构建。平信徒和神职人员都加入沙龙, 他们在身份上没有高下之分。例如, 在改革派代表贡扎加枢机 (Ercole Gonzaga) 治下的曼图亚主教区, 此类沙龙就尤为兴盛。在意大利的不少城市, 有关《保罗书信》的公开讲座也所在多有, 且能吸引大批听众。在时人看来, 既然本堂神父或教区主教大半忽视牧灵教导的职责, 也无意改造自身, 倒不如让人们自己学习有价值的东西以救赎灵魂。沙龙也好, 讲座也罢, 其中的确反映出这样一种现象: 虽然教会的权力阶层在改革方面频频让人失望, 但在活生生的信仰实践中, 回应个体生命的信仰问题之追求始终在进行, 思考教会角色与基督教信仰本质的做法也从未停止。

(二) 体制危机

思想或心态往往是制度的体现。上述的身份认同危机以及信众的回应与追求, 实则说明天主教会的结构危机或体制危机异常严重。中世纪晚期天主教会的腐败与积弊满载于古人的记录之中。不过, 近来已有学者指出: 一方面, 古人对教会困境的描述以价值判断为基准, 不无夸大之处, 缺少同情之理解; 另一方面, 彼时教会的贪腐问题并不比中世纪早期与盛期更加突出。^③ 事实上, 天主教会从未停止过革新 (ecclesia semper reformanda), 却也陷入“永恒的悖论”。这乃是以其结构本质决定的。概而言之, 中世纪千年, 教会结构始终与封建结构束缚在一起, 从而形成一种共生关系。格里高利七世的改革虽被后世学者誉为“教皇革命”, 却无可能从根本上解决

^① Paolo Simoncelli, “La crisi religiosa del cinquecento in italia”, *La storia*, Volume IV, pp. 252 – 254.

^② Dermot Fenlon, *Heresy and Obedience in Tridentine Italy: Cardinal Pole and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20 – 23; Gigliola Fragnito, *Cinquecento italiano: Religione, cultura e potere dal Rinascimento alla Controriforma*, Bologna: il Mulino, 2011, pp. 141 – 151.

^③ John W. O’ Malley, *Trent: What Happened at the Council*,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2013, pp. 38 – 40.

问题。社会变迁始终是天主教会面临的挑战与张力。

自中世纪晚期以降，新的专制政府发展迅速，中世纪的法律机制——即试图将行政权力屈服于自然法以及将每一个重要的既得利益集团联合到国家管控的方式——开始衰落。“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的力量”，是其时专制王权的座右铭，法国与西班牙的王权允称代表。在意大利，领地国家如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以及那不勒斯等，则落入独裁统治或寡头专制的统治模式。教皇国亦不例外。在爆发宗教革命的神圣罗马帝国，乃是领地诸侯而非帝国皇帝得以从这一政治趋势中大获其利。随着帝权衰落，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大一统心态益发消散，与之相映照的则是建基于民族心态的专制主义力量在迅速发展。^①王权崇拜渐成主流，基督教共同体的普世法律原则渐被抛弃，教会的普世统治遂成明日黄花。

伴随政治变迁的乃是经济变革。

其中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教士职位（或曰神职圣俸）被视为一种绝对报酬或投资渠道，而不再被严肃地视作伴随责任义务而设立的教牧职位。故而，在整个教会弥漫着从主教职位到神父圣俸的赤裸裸的交易。围绕教会圣俸体制出现的一系列腐败问题，当然有人性本身脆弱的原因，但本质上却深植于当时的社会结构之中。

三、应对危机的多声部革新思潮

虽然天主教会面临上述危机，但虔诚的个体与团体并未放弃自身理念。相反，它们始终戮力革新，只不过采取了不同的路径与方法。可以说，在16世纪晚期以前，天主教会拥有多重革新思潮，历史本可能有多种选择。

（一）回归本源：人文主义改革家伊拉斯谟的革新理念

在当时的意大利社会，人文主义者希冀以古典德行的自然主义标准来重塑教会的信仰与习俗，而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假设和强调人类实则具备“天然的善”。由此带来的则是教会的人类“堕落说”受到冲击。实际上，对于古典世界而言，教会后来宣讲的基督教美德——谦卑、苦行克制以及内敛谦逊等等，在当时本是陌生的概念。在伊拉斯谟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巨匠发掘古典资源并掀起“回归本源”的浪潮中，上述基督教美德受到冲击。在这一时代趋势中，世人益发选择远离中世纪的“苦行修道观”，转而寻求在现世“成圣”。再加之古典文学记载的“享乐主义”生活观被人文主义者发掘出来，且恰好与时代接榫，并被时人所认可和接纳，故而以经院哲学为根基且仍保有中世纪色彩的教会学说面临巨大危机。如果放眼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社会，可以说，无论是平信徒还是教职人士，无不追求酣畅淋漓的感官享受，也无不在有形的体验中放纵自我，而适应中世纪社会的基督教伦理则频遭挑战。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16世纪的头二十年，伊拉斯谟及其学说不仅吸引了全欧洲的知识精英，而且尤受意大利精英阶层的看重与推崇。

伊拉斯谟对古典文化的认可，即他的古典主义情结，始终服务于其基督哲学。在游历欧洲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释经学问精进的过程中，他益发驳斥流行于大学教育中的经院哲学。在他看来，如果说存在一门真正有用且有意义的哲学，那么便是基督哲学。在翻译与诠释圣经的过程中，伊氏逐渐确立基督哲学的三种特质。其一，是以基督为中心，亦即：万事万物都指向基督并回归基督，唯有来自天堂的基督才是人师，才配讲授专门的教义，而且因着永恒的智慧成为人类救赎的唯一源泉。其二，是注重人的内在生活而非教义或礼拜仪式的繁琐细节。换言之，伊拉斯谟看重人的内在敬虔与个体革新，并以此为革新教会的基础。而且，他并不高看王

^① A. G. Dickens,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9, pp. 9-18.

宫贵胄、神哲大家以及高级教士在俗世的功名财富，他认为内在地掌握基督传达给世间的信息要远比财富、荣耀与权力重要得多。其三，伊拉斯谟与路德等人不同，他对人性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认为异教的经典著述对于基督信徒大有裨益。于他而言，基督哲学堪称人性的重生。^①

总之，伊拉斯谟始终以基督为中心，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借助其学问让信众得以经历宗教上的启迪并改造自身的德性，他的所有学术研究都以革新教会为宏旨。

（二）淑世济民：宗教社团神爱宣讲会的革新理念

宗教社团（Confraternities）是16世纪意大利宗教虔敬运动中最活跃的一类群体。其实，宗教社团早在中世纪晚期就已存在，由男女平信徒——手艺人、贵族等——为主体，不过教士也经常参与。与传统的隐修会或托钵僧团不同，宗教社团并不要求成员发永久誓愿，成员大多在尘世中从事日常工作，根据团规在专门的时间与场合参与集体活动。可以说，宗教社团与城镇行会在组织架构上颇为相似。^②此外，宗教社团最初与宗教修会颇有渊源，往往由某修会的第三分会发展而成。譬如15世纪末的“耶稣五伤”社团（Cinque Piaghe di Gesu）就与方济各严守戒律派渊源甚深。及至16世纪，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冥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愈发与积极生活（vita activa）联系在一起，两者逐渐成为有机的统一。在当时战争频繁、社会变动加剧的背景下，爱上帝爱邻人的慈善救助活动愈来愈多。例如，在意大利半岛，梅毒与斑疹伤寒成为肆虐当时社会的流行病，孤儿的出路、妓女的从良以及普通人的临终关怀更是常见的社会问题。鉴于此，普通平信徒、虔诚的贵族男女、教士僧侣等在属灵和人性的要求下，纷纷组成中小规模的团体来淑世济民。在他们看来，没有善工的信仰是没有活力的。建立于热那亚的神爱宣讲会（the Oratory of Divine Love）便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

神爱宣讲会的创始人是维尔纳扎（Ettore Vernazza）及其三位友人。他们敬重当时的神秘主义人士兼救济院执事费艾思奇（Caterina Fieschi），奉她为灵性的典范与道德的楷模。此社团的成员最初都是热那亚人，其中有几位还有神品。神爱宣讲会旨在通过宗教虔敬活动并藉由慈善义举来实现成员的个体成圣。成员寻求通过频繁的宗教服务活动而在自己的内心播下神爱的种子。^③因此，他们花费大量时间在救济院服务病人。此种目标与追求在意大利并不鲜见，与当时其他宗教社团（特别是救济院）意气相投。^④

自1514年起，神爱宣讲会在罗马设立分支，可见其影响力已达至教皇国的中心。罗马的神爱宣讲会不仅给意大利中部的信仰实践带来活力，而且因其位于教皇国的首善之区而能招徕更多重要的成员，从而为天主教复兴提供人力。譬如迪耶纳（Gaetano da Chieti）和卡拉法（Gian

① J. Laurel Carrinton, "Desiderius Erasmus", in Carter Lindbert, ed., *The Reformation Theologians: An Introduction to Theology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pp. 37–38.

② 本文将 confraternities 译作“宗教社团”而非中文坊间常见的“兄弟会”一词，主要是因为当时的这类平信徒属灵组织并不只由男性组成，实则不少女性也参与其中并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在16世纪中期，以女性为主的宗教组织更是层出不穷。故而“兄弟会”这一“偏男性”的用法是不妥当的。关于宗教社团与意大利天主教会革新之间关系的宏观梳理，可参见 Christopher F. Black, "Confraternities and the Parish in the Context of Italian Catholic Reform", in John Patrick Donnelly and Michael W. Maher, eds., *Confraternities and Catholic Reform in Italy, France, and Spain*, Kirksville: Thomas Jeffers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26.

③ John C. Olin,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Savonarola to Ignatius Loyola*,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pp. 1992, 16–17.

④ Nicholas Terpstra, "Confraternities and Public Charity", in John Patrick Donnelly and Michael W. Maher, eds., *Confraternities and Catholic Reform in Italy, France, and Spain*, Kirksville: Thomas Jeffers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97–121.

Pietro Carafa) 都深受神爱宣讲会的感染和激励,他们尔后创见了自己的新派修会——德亚底安会 (the Theatine Order), 并培养了不少为意大利主教制度改革做出贡献的实力派人物。^① 神爱宣讲会还陆续在布雷西亚、维尼察、维罗纳以及威尼斯等地设立分支,在意大利各地进一步推动了宗教社团淑世济民的理念。

伊拉斯谟曾在名作《愚人颂》中抨击揶揄好色贪婪的隐修士和托钵僧,这说明当时的修道制度与修道精神的确出现严重问题。但与此同时,为了因应当时的社会状况,以神爱宣讲会为代表的新时代宗教社团却以个体主义和积极行动为特质,给天主教的属灵修为与教会革新注入了新的活力。个体的内在宗教体验以及行动中的个体圣化成为 16 世纪意大利教会革新的一大特色。

(三) “行动中的冥思”: 新派修会耶稣会的革新理念

在天主教思想的语境中,“革新”一词不仅指向教会制度,还有另一种含义,即个人的自我革新。16 世纪的教会革新理念虽然外在形式多样,但其底色相同,即在敬虔活动中以基督为中心。革新者视基督为造物主与世间万物之间的终极中保 (supreme intermediary)。^② 罗耀拉及其同伴创立的耶稣会就以此作为革新教会的基础。诚如美国史家奥林 (John C. Olin) 所指出的,以罗耀拉为首的耶稣会士念兹在兹的是一种在尘世间履行义务、荣耀上帝的“朝圣之旅” (pilgrimage)。^③ 罗耀拉将自己目为灵魂救赎中的旅人 (traveller)。因此,所谓“基督的士兵” (soldier of Christ) 一说或许适用于罗耀拉,但该词的重要性不应被夸大,而且它也不是耶稣会思维中的关键内容。虽然罗耀拉的宗教思想有多个维度,但内在的、属灵的“朝圣之旅”当可作为一个关键角度来理解他的宗教观。^④ 也正是藉由此角度,奥林将耶稣会诠释为朝圣的司祭 (pilgrim priests)^⑤,以之强调耶稣会以行动中的祈祷为朝圣之旅,奉教宗为圣彼得,以四海为家、广泽灵魂、愈显主荣为朝圣理念。

此外,对于耶稣会的内在朝圣理念,教会史名家奥马利 (John W. O' Malley) 呼应了奥林的看法。他以“行动中的冥思” (contemplation in action) 为切入点,对这种个体革新的理念做出更为精细的析论。他指出,第一批耶稣会士将自己的牧灵工作视为“行动中的冥思”,以“流动性” (mobility) 为展开工作的前提。在他们眼中,只要此岸世界有愈显主荣的希望存在,只要有灵魂的善存在,他们便愿意走遍天涯海角。那么,何为“行动”? 何为“冥思”? 奥马利解释道“行动”是指永不停歇的旅程与探寻“冥思”则是要求耶稣会士本人无论是在修会内部,抑或是在旅途中遇到干扰与麻烦,都要保持与上帝的合一。^⑥ 对于耶稣会对教皇的服从之誓愿 (即第四誓愿),奥马利认为,第四项誓愿并非是隐修士遵循的“稳定的誓愿”,实则是为了帮助灵魂,欣然准备踏上尘世旅程的一项誓愿。^⑦ 也就是说,服从教皇的誓愿应置诸“为了开展牧灵

① Michael A. Mullett,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9, pp. 70 - 71.

② Eric Cochrane, *Italy, 1530 - 1630*, London: Routledge, 1988, p123.

③ 在传统的教会史研究中,耶稣会总是被描述为教宗的连队、完全服从教宗的僵尸,好像该组织并没有自己的宗教理念与追求,其出现的目的只在于反抗、打击新教。晚近,此种史观早已被修正。学者们开始以“神入”的方式、以当时的宗教语境来审视耶稣会的第四誓愿及其传教的“流动性”特质。而且,有的学者如奥林,更是以文本细读的方法,发掘、考察耶稣会愈显主荣的朝圣观。相关研究可参见 John W. O' Malley, “To Travel to Any Part of the World: Jeronimo Nadal and the Jesuits Vocation”, *Studies in the Spirituality of Jesuits*, 16, No. 2 (March 1984), pp. 1 - 20; John C. Olin, “The Idea of Pilgrimage in the Experience of Ignatius Loyola”, *Church History*, 48, No. 4 (December 1979), pp. 387 - 97.

④ John C. Olin, “The Idea of Pilgrimage in the Experience of Ignatius Loyola”, *Church History*, p. 389.

⑤ Ibid. , p. 396.

⑥ John W. O' Malley, “To Travel to Any Part of the World: Jerónimo Nadal and the Jesuit Vocation”, *Studies in the Spirituality of Jesuits*, p. 3, p. 11.

⑦ John W. O' Malley, “Mission and the Early Jesuits”, *The Way*, supplement 79 (1994), pp. 7 - 8.

工作而遵循的传教使命”之中予以理解。耶稣会士将教皇视为普世教会的“普世牧者”；其教牧职责，即“圣彼得的教牧职责”，乃是要关怀所有的灵魂，特别是那些还未得到牧者关怀的灵魂。耶稣会士就是要借助第四项誓愿，“分享”这一教牧职责。故而，奥马利明确指出，这项誓愿并非是服从教皇的一种普通表述，而是指明：耶稣会士将自身无条件地献给尘世中的牧灵工作。^①易言之，耶稣会的首要原则不是忠于教皇，而是要在尘世中任何有希望实现愈显主荣的地方开展教牧工作。^②

可见，以耶稣会为代表的前现代属灵追求，依托的乃是基督教人文主义的教育理路，接续的乃是圣经与古代教父对“个体皈依”与“个体革新”的体认。这也应和了伊拉斯谟之“修道主义并不等同于虔诚”（*monachatus non est pietas*）的看法。换言之，皈依基督并以基督之名在尘世积极生活并提供行动中的服务，才是耶稣会“行动中的冥思”之根本。^③对此，英国教会史家伊文尼特（H. Outram Evennett）曾精彩地将之概述为：行动就是祈祷，而祈祷诱发动作。^④此种信仰进路，与反抗新教的宗教改革无关，也与天主教会的体制改革相异，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也足见当时教会革新理念之多元。

（四）医治灵魂与规训灵魂：改革派主教吉贝蒂的革新理念

吉贝蒂（Gian Matteo Giberti）有“使徒的化身”（*Homo Apostolicus*）之美誉，^⑤他和孔塔里尼（Gasparo Contarini）等人是公认的16世纪前期的改革派领袖。吉贝蒂于1495年出生在西西里岛的帕勒莫，先在博洛尼亚大学研读法律，后由其父引介进入罗马教廷任职。1513年，18岁的他便担任教皇利奥十世的堂弟朱利奥（即后来的克莱门特七世）的私人秘书。^⑥吉贝蒂不仅得到朱利奥的青睐，而且也赢得利奥十世的信任。克莱门特七世上台后，吉贝蒂更荣升教廷官员候选人资格审查主管（*le dataire papal*），成为教皇最为依仗的政治顾问。^⑦由此，早已与查理五世和亨利八世等君王打过政治交道的吉贝蒂，日益卷入风云诡谲的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的斗争之中。但相较于教廷同僚，吉贝蒂虽难逃利益之网的束缚，但在对神职人员的品行操守方面则有相当的坚持，这与其曾受到萨沃纳罗拉以及神爱宣讲会的影响不无关联。实际上，吉贝蒂早岁便很欣赏神爱宣讲会的宗教理念，自己也萌生过进入多米尼克修会的想法。他还支持卡拉法领导的神职班修会德亚底安会。由于卡拉法此前还担任过主教，所以吉贝蒂也从中受益很多。在罗马教廷，吉贝蒂尽可能为基督教人文主义者提供机会。譬如，他与伊拉斯谟私交甚笃，并给予后者不少帮助。

在1524年被任命为维罗纳主教之前，吉贝蒂由于个人的因缘际会以及宗教体验，便早已开始关注教会革新，并在罗马教廷采取了一些措施。譬如，他要求教廷中的神职人员严格按照教会法的规定，穿教士服、修剪胡须、行为举止得体。1524年被提名为主教后，吉贝蒂完成祝圣礼，并放弃其他圣俸，而只保留了自己的主教圣俸。^⑧因为暂时难以摆脱教廷事务，他指派了一位颇

① John W. O' Malley, "To Travel to Any Part of the World: Jerónimo Nadal and the Jesuit Vocation", *Studies in the Spirituality of Jesuits*, p. 10.

② Ibid., pp. 10 - 11.

③ John C. Olin, *Catholic Reform: From Cardinal Ximenes to the Council of Trent, 1495 - 1563*, p. 25.

④ H. Outram Evennett, *The Spirit of the Counter-Reformation*,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70, p. 75.

⑤ Paul Broutin, *L' Eveque dans la Tradition Pastorale du XVI Siecle*, adaptation française de "Das Bischofsideal der Katholischen Reformation", par Hubert Jedin, Desclee de Brouwer, 1953, p. 44.

⑥⑦ L. Cristiani, *L' église à l' époque du concile de Trente*, Paris: Bloud & Gay, 1948, p. 269.

⑧ Paul Broutin, *L' Eveque dans la Tradition Pastorale du XVI Siecle*, adaptation française de "Das Bischofsideal der Katholischen Reformation", p. 44.

有素养的代牧来暂时处理教区事务。

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中，吉贝蒂是克莱门特七世最为依仗的智囊，对于其亲法国抗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策略影响很大。但始料不及的是，1527年5月，查理五世的军队攻陷罗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罗马遭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最大浩劫。后世常常把1527年的“罗马浩劫”视为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结束。不过从另一角度看，称这场浩劫为教会革新的分水岭，亦不为过。盖因其狠狠打击了罗马教廷的政治野心，使得此后的教皇无时无刻不在神圣罗马帝国的阴影中挣扎。此外，这场浩劫虽然让罗马教廷在随后的几年中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无法自上而下地推动改革，却客观上迫使曾经游走于教廷的教会政治家选择远离教廷，回到自己的主教区开创事业。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便是吉贝蒂。在这场政治浩劫中，吉贝蒂虽苟全性命，然由于他此前亲法的政治立场，其教廷职业生涯宣告结束。此后，由于查理五世的再三阻挠，他始终未能被拔擢为枢机。1529年，吉贝蒂首次入住自己的维罗纳主教府，开启其革新历程。吉贝蒂的做法触动了不少教职人士，他们争相效法，回归牧者的路径。这无疑“罗马浩劫”给教会革新带来的一个有益的客观结果。

吉贝蒂甫抵维罗纳便发现，由于主教区多年没有主教驻籍，结果上行下效，辖区内不少本堂神父也不履行教牧职责。基层神父大半不识基本的拉丁文法，以致吉贝蒂不得不命人将弥撒经文译译为意大利文。此外，在教区内的众堂区，神父更是生疏于布道讲经，信众的悔罪苦行亦无人监管。^① 据此，吉贝蒂认为，其主教区改革的第一步便是确保主教驻跸于辖区。实际上，除了任内不得已的短暂外出之外，自踏入主教辖区一直到1543年12月30日遽然离世，他始终恪守主教居于辖区的职责。吉贝蒂以身作则，为同时代的改革派所认可与称赞。至于改革的核心目标，对于他来说，乃是以“医治灵魂”（cura animarum）为前提，重新恢复并强化主教之权威。吉贝蒂认为，主教是地方教会机体的核心，故其改革均围绕此理念展开。^② 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吉贝蒂还延揽栽培几位熟识的贤士，譬如弗拉米尼奥（Marcantonio Flaminio）、克利斯波蒂（Tullio Crispoldi）、奥尔马内托（Niccolo Ormaneto）等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奥尔马内托后来被米兰大主教博罗梅奥（Carlo Borromeo）任命为自己的教区代牧，兢兢业业辅佐后者，推动当地的改革。奥尔马内托后来还被博罗梅奥举荐，赴罗马辅佐教皇庇护五世改革教皇内府和当地的宗教机构。^③

吉贝蒂在维罗纳开展了严格的主教教牧巡查。在他看来，教牧巡查不仅是主教的一项基本职责，而且也是实施改革的最为可靠的手段之一。^④ 实际上，早在刚驻跸于教区的1529年，吉贝蒂便对“居于俗界的教士”（secular clergy）与“居于僧界的修士”（regular clergy）展开严格的审查，对不服管教、不符条件、私生活不检点之人，均予以纠正和惩罚。对于当地神职人员、修道团体手中的各种限制主教权威的特权与豁免权，吉贝蒂亦是严厉打击。特别是当地修女院往往由贵族成员主导，修女生活作风问题严重，但同时仰仗僧俗两界势力的庇佑，故而修女院对吉贝蒂的牧灵巡查极为抵触。在此种情况下，吉贝蒂只得求助教皇与威尼斯政府的帮助。^⑤ 由于与克莱门特七世渊源甚深、私交甚好，吉贝蒂得以获得“教皇钦定全权特使”

① L. Cristiani, *L' église à l' époque du concile de Trente*, p. 271.

② Paul Broutin, *L' Eveque dans la Tradition Pastorale du XVI Siecle*, adaptation française de “Das Bischofsideal der Katholischen Reformation”, p. 48.

③ Ludwig Von Pastor, *The History of the popes from the Close of the Middle Ages*, Vol. 17 (Pius V, 1566 – 1572), St Louis: Herder, 1929, pp. 138 – 142.

④ L. Cristiani, *L' église à l' époque du concile de Trente*, p. 272.

⑤ 维罗纳主教区隶属于威尼斯共和国。

(*legatus de latere*)^①的头衔,这一头衔意味着教皇对其改革措施的授权与认可。保罗三世上台后,为推动改革曾召吉贝蒂加入孔塔里尼与卡拉法领导的教会改革委员会,共同起草《教会改革建议书》(*Consilium de emendanda ecclesia*),故而对其改革亦大为支持,同样给予其“教皇钦定全权特使”的头衔。就吉贝蒂之求助威尼斯政权来看,因其与孔塔里尼同具改革之心,且彼此惺惺相惜,因而在后者的帮助下,得以获得世俗政府的支持。凡此种种,确保了吉贝蒂改革的效力与广度。在此必须强调:吉贝蒂正是凭借“教皇钦定全权特使”的头衔,方可直面各种反改革势力的反击,但倘若教皇没有给予这类支持,主教则很难在教区大刀阔斧地开展改革。而且,一旦教区超出教皇国的势力范围,譬如像维罗纳主教区这类严格掌控在威尼斯地方强势集团手中的主教辖区,那么,主教的教区改革则会压力更增,不得不时与世俗力量发生碰撞。这是当时的社会结构和教会结构使然,这也正是教会体制革新的难点所在。

吉贝蒂是16世纪欧洲等级社会中的统治集团成员,自上而下的规训与惩戒乃是其必然的思维定势。除了对平信徒参加圣礼的次数非常关注之外,他还命令主教区内的各教堂设立告解室,一方面旨在保证忏悔之人的隐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确保教会对于信众的精神规训。他的这一主张,对后来博罗梅奥大力推广告解室机制有很大影响。此外,16世纪是平信徒互助性宗教社团勃兴的时代,成员除了在生活与信仰方面彼此照应之外,还参加社会救济等活动。但对于僧俗两界的统治阶层来说,宗教社团之力量逐渐壮大是让他们甚为恐惧与反感的事情。毕竟,社会基层的民众组织与自上而下的统治力量时相冲突、龃龉不断。如何督导、利用甚至控制它们,是当时主教面临的难题。实际上,主教之全面掌控平信徒社团,要到16世纪后期方才开始。而吉贝蒂却是16世纪前期少数善于利用平信徒组织的主教代表之一。譬如,在其任内,就组建了基督之爱社团(*Societa della Carita*)。此社团在当地的每个堂区皆有分支机构,用于扶危济贫,督导穷苦人的属灵生活。^②

在16世纪前期,天主教会并没有统一专门的神学机构或学校来训练未来的神职人员,更多的是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模式,让年轻人熟悉教牧工作的大体程序并掌握相关技巧。^③学生的素质大半取决于师傅本人的水平与责任心,学生大多要靠自己的努力修行才能保证一定质量的神学修为。^④而吉贝蒂有意识地在维罗纳创办了神职人员学院,旨在为有志服务教会的男孩提供基本的礼拜仪式培训以及基本的教牧技巧(如歌咏、识人术、主持仪式等),确保神品候选人的道德修养。这种神职人员学院逐渐成为近代早期改革派主教参照模仿的范例。

吉贝蒂还充分利用威尼斯与维罗纳的印刷机构来印刷、出版自己的教牧作品。由于他常年浸润于人文主义学问,故而除了充实治下图书馆的希腊文藏书之外,还筹划设立了一个平信徒组织——吉贝蒂学园(*Accademia Gibertina*),用以款待、资助人文主义学者与诗人。吉贝蒂后来还在自己的主教府安装了一台印刷机,用来印刷圣经评注等作品。^⑤特别重要的是,在其离世前,他还在保罗三世的许可下,于1542年出版了自己的主教区教规——《吉贝蒂规范》(*Constitutiones Gibertinae*)。这些教规涉及教区戒律改革的方方面面,内容详实,是重要的改革文献,对近代早期的天主教革新影响甚巨。

① Adriano Prosperi, “Gian Matteo Giberti”, in Hans J. Hillerbrand, ed.,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the Reformation* (vol. 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74.

②⑤ John C. Olin,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Savonarola to Ignatius Loyola*, p. 134.

③ 刘城《业功能的转变:从演绎宗教礼拜仪式到宣讲上帝之言》,参见氏著《英国教会史论文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3页。

④ 关于主教区与宗教修会的神父培养,可参见 John O’Malley, “Diocesan and Religious Models of Priestly Formatio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in Robert Wister, ed., *Priests: Identity and Ministry*, Wilmington: Michael Glazier, 1990, p. 55–58.

四、从多重选择到单一路径

16世纪意大利天主教会的多重革新思潮，虽然在起源与特点等方面有所不同，但都指向宗教复兴，它们在一段时间内共存于一个相对和谐的氛围。换言之，当时的天主教会官方是能够包容它们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追求革新的团体和个人往往彼此之间有频繁且良性的互动。譬如，吉贝蒂与伊拉斯谟之间就是如此，前者保护后者，而后者给前者带来灵性的激发。共同生活兄弟的敬虔实践则深刻地感染了吉贝蒂的属灵追求，后者在自己的主教区始终为宗教社团留有活动空间。至于耶稣会，其思想体系也暗含伊拉斯谟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此外，无论是伊拉斯谟、共同生活兄弟会，抑或是耶稣会，都从根本上追求以基督为中心的敬虔方式。即便是吉贝蒂这类教廷出身的改革派主教，在属灵深处亦是如此。不过，与主教背景出身的吉贝蒂不同，伊拉斯谟、共同生活兄弟会以及耶稣会皆游走在体制的边缘，甚少关注天主教会的官方机制。实际上，16世纪晚期之前的天主教会并不是专制形态的单一组织。彼时抨击教士腐败与教皇专断的人士如意大利人文主义巨匠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并不能超越时代看到这一点。此外，16世纪晚期之前的天主教会也与19世纪晚期敌视自由主义的天主教会大为不同，这是直到今天仍旧不为许多人所重视的地方。可以说，中世纪晚期与近代早期的天主教会类似于一种“联邦”组织，由众多不同的组织所构成，那些组织在结构、起源以及方式方法等方面都有所差别，而且它们彼此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如果说存在一个共同点的话，那就是它们都忠于教皇制度。

但是，旨在革新教会的“多声部合唱”自1542年起愈益遭遇挑战。如果说在16世纪40年代之前，罗马教廷出于惯性思维，在内忧外患中尚能容忍多元甚或极端的属灵省思，那么随着新教运动的勃兴与壮大，特别是随着新教思想经由商路广泛渗入意大利地区从而带来更激烈的思潮冲击，于1542年重建宗教裁判所以应对形势便成为保罗三世的选择。曾经与吉贝蒂等人共同为革新出谋划策的那不勒斯人卡拉法成为宗教裁判所的首任掌管者，他与曾经的改革同辈渐行渐远，要求强力镇压多元革新思潮以维护罗马的中央集权。恪守教条、整肃异己、维护集权，便成为以卡拉法为代表的强硬派的思维理念。^①

此外，特兰托大公会议虽然奠定了回归牧者精神的教会改革理念，但改革教令（de reformatione）通篇都以“居于俗界的教士”与“居于僧界的修士”为重点。以共同生活兄弟会和耶稣会为代表的宗教社团与新派修会以及平信徒革新运动并不被此会议所关注。会议的主要参与者从“自上的视角”、从体制的层面审视天主教会，他们的革新思维以戒律改革为主，无视多元的革新思潮。主要原因就在于对教会官方而言，在新教的宗教革命的大背景下，宗教社团与新派修会掀起的自下的革新运动益发有颠覆建制性教会的危险。不止如此，就神学教义而言，特兰托大公会议针对因信称义的问题做出了极为细致的说明，从理论上彻底否认了新教的唯信称义说，而且也不再允许天主教会内部就称义问题有其他看法与讨论。^② 这也就彻底消除了天主教会与新教和解的任何可能性。像伊拉斯谟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这类革新理念，既主张信仰调和，又在一定程度上同情甚至认可路德称义说，而且其对体制弊病的赤裸裸的揶揄讽刺早已成为教俗两界打击教会的武器，因而不再被教会官方所容忍。实际上，早在1537年的《教会改革建议书》之中，卡拉法等人就已经主张限制伊氏作品在基督教学校中的使用了。^③ 特兰托大公会议前后，这

① Adriano Prosperi, *Il Concilio di Trento: una introduzione storica*, Torino: Einaudi, 2001, pp. 143 – 152.

② Ibid., pp. 59 – 60.

③ John C. Olin,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Savonarola to Ignatius Loyola*, p. 194.

位人文主义者的著述屡次被列入《禁书目录》，也就不足为奇了。

再审视当时的时代背景，便可发现：16世纪晚期的教皇集权是时代趋势。^①易言之，这是天主教会上层承继并进而改变文艺复兴有关人的理念之自然结果。在文艺复兴时代，人之被重新发现自不待言，将人理性化与工具化堪称当时的潮流。人的行动，诸如参与社会组织或政治组织等，随着经济发展和海外拓殖的加速而得以有新的价值体现。譬如，时人就认为，人乃宇宙的典范，因着自己的精神从而有能力形塑自己的命运。人在选择和发展自身道路的过程中，是独一无二的，是自由的。伊拉斯谟就曾言“人不是生而为人，而是渐而成为了人。”如果说文艺复兴时代人的自由与价值尚能被发现并被乐观积极地评价，那么随着历史进入16世纪晚期，特别是随着领地国家与民族国家愈加发展，乃至中央集权与专制主义进一步细化，人的“理性化”便与文艺复兴时代逐渐有所差别。人的价值重新被评估。伊拉斯谟、莫尔以及米开朗基罗等“文艺复兴人”类型的巨匠逐渐淡出，人更多地是被按照其作用和价值来考量。随着专制主义的发展以及对之加以因应的欧洲政治思想的嬗变，社会愈发强调秩序和规训，强调人在既定秩序中的位置。职是之故，“一体两魂”的教皇并不满足其属灵权威，而是希望在藉中央集权来回应时代需求以及应对世俗权威挑战的过程中，寻求信众有臣民式的服从。循此逻辑，在1588年，教皇西斯科特五世改组罗马教廷，将枢机团成员从中古晚期沿用的24人扩充至70人，同时命枢机团成员负责15个部门，其中6个负责教皇国的管理实务，其余9个负责普世教会的管理事务。此举大为削弱了枢机团的权力，枢机也从此被改造为职业科层官员。^②实际上，教皇的集权做法促使其他世俗君主不得不采纳相类似的措施来适应时代变化。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教皇取得了对特兰托大公会议与天主教革新的唯一解释权。会议的教牧改革理念被教皇巧妙转变为加强集权的工具，早在此会议之前出现的多重革新思潮逐渐被消声。^③罗马在诠释特兰托改革的过程中，将原本多元的教会革新思想单一化、主义化、一致化，并且同时否决基层改革的地方性和独特性。由此“特兰托主义”成为一种历史结局。在封闭的“特兰托主义”中，不要说此前伊拉斯谟那些体制外的革新人士，就连16世纪末对教皇至真至诚的改革派主教博罗梅奥，也只是教皇实现自身目标的工具，他们非但不可以持续发声，甚至最终被消音以致失去原有的历史面相。^④这当然是革新群体的悲剧，但这也是时代的趋势，个体力量无法扭转。

(责任编辑：袁朝晖)

①③ Adriano Prosperi, *Il Concilio di Trento: una introduzione storica*, pp. 163 - 164, pp. 88 - 94.

② Elena Bonora, *La Controriforma (Quinta edizione)*, pp. 40 - 43.

④ Alain Tallon, *Le concile de Trente*, Paris: Cerf, 2007, pp. 65 - 83.